

一九四〇年日本對華和平工作 ——「錢永銘工作」——

藤井志津枝

摘 要

日本史學家秦郁彥在其所著『日中戰爭史』（河出書房新社，頁一五七）一書中，敘述說「桐工作」和「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設計的謀略圈套。的確，「錢永銘工作」是有許多值得懷疑的疑點。特別是以日本外務省中樞為謀略目標的「錢永銘工作」，正好與重慶方面所設計的圈套「宋子良工作」，與日本參謀本部的「桐工作」以及樹立汪兆銘南京政權工作期間，相互重疊。換言之，在一九三九年末至一九四〇年初冬，和平工作以汪兆銘政權樹立為基軸，中日兩國展開政略與錯綜複雜的“誘和”謀略。日方展開的“誘和”謀略，是以達到軟化蔣介石抗日立場為目的；而中國方面同樣也以謀略方式對應，探求戰勝之道。

本篇論文將「錢永銘工作」分為前期（自一九三九年末起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汪兆銘“還都”南京為止）及後期（一九四〇年七月歐戰爆發起至十一月為止）論述。前期日本人西義顯與中國人張競立各有用心，積極地相互接觸並急欲說服對方，但沒有得到任何效果而陷入消極性接觸狀態，算是僅相互維持該和平路線的時期。到了後期，「錢永銘工作」才進入正軌。在短期的中斷後，西義顯和張競立再度接觸，兩人所保持連繫的該路線，一時之間成為日方唯一

*作者為本校東語系教授

能期待的和平工作。這段時期，日本決定締結三國同盟，導致對「桐工作」發展的阻礙，並且不惜對美戰爭，毅然決定“南進”政策。於是，隨著日本表明反英美立場，中國政府遂藉由錢永銘向日本外務省提出：①日軍全面撤退，以及②日本無限期延長承認汪兆銘政權等兩個和平條件，決定站在英美陣營與反軸心國的立場。而且中國方面不等待日方的答覆，主動結束與日交涉。因為中國重慶政府早已預料到己方始終堅持、決不讓步的對日和談二條件決不會被日方接受。因此，可以說中國方面藉「錢永銘工作」的機會，向日本表明今後不與日方接觸之意；再藉由此二和平條件，向日方表明堅持抗戰的決心，算是以此二條件代替對日宣戰吧！

到了一九四二年，隨著中日戰爭即併入太平洋戰爭的一環之後，中日兩國間的和平工作完全中斷，甚至連偵探性質的相互接觸也沒有。然而，日本的支那派遣軍仍未完全放棄“誘和”之圖，於一九四二年擬定利用日方「抑留華人」秘密地對重慶展開諜報工作的計劃。其中一路線為「周佛海—錢永銘—張群」，可見日方經歷一九四〇年「錢永銘工作」後，並未從中汲取“慘痛”的教訓。

一、西義顯·張競立互謀和平諜報

一九三九年末，日本方面除了原奔走於對汪兆銘「梅工作」的“梅機關”之外，出現另闢對重慶直接接觸路線的和平運動——即參謀本部的「桐工作」和西義顯的「錢永銘工作」。他們對汪工作的變卦，感到不滿。汪兆銘的和平工作，原先的目標是在重慶與日本佔領區之間樹立第三勢力，而藉此建立中間獨立的緩衝地帶政權，以達到瓦解蔣介石抗日陣營之目的，但因汪兆銘未獲西南將領支持，而宣告失敗。不久，汪兆銘離開河內到上海後，結合褚民誼、傅式說及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等擁汪勢力的支持，決定將原本設置獨立於日本佔領地區第三勢力政權的和平工作構想，轉變為在日本佔領地成立中國中央政權（註一）。

註一 關於「梅工作」，請參照藤井志津枝著『日本の對華和平工作』第二章（台北、文英堂、一九九三年）頁五一～一二六。

汪的構想，令參謀本部今井武夫大佐和滿鐵南京出張所所長西義顯大失所望。今井等參謀本部的和平派，認為汪兆銘無法解決中日戰爭，故另派遣鈴木卓爾中佐至香港，展開「“宋子良”對重慶直接和平工作」。雖然在一九四〇年一月遭受「高陶事件」（即高宗武和陶希聖脫離汪陣營時公開日華協議書等賣國文件）的打擊，但「宋子良工作」進展順利，不由得讓今井感到懷疑「為什麼會發展到這種程度呢？」二月經今井等接洽，決定中日兩國各派代表，舉行預備會議。於是，日本的中央政府在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命名為「桐工作」，並且上奏天皇。

另外，由於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對於將引出汪兆銘的「梅工作」轉變為日本陸軍的特務謀略，成為土肥原賢二中將的「要人離反工作」的一環，淪落為興亞院在日本佔領地內統治的傀儡機關感到不滿。因而，西義顯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脫離該工作，另行摸索新的和平路線（註二）。但是西義顯並非以一民間和平工作者身份進行，在他的背後有在中國擁有最大利權的滿鐵組織，特別是來自松岡洋右的鼎力支持。西義顯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擔任重新營業的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的職位。該事務所在九一八事變後關閉、後又重新營業，其主要原因乃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首都瑞金失守，國民黨收復該地，出現蔣汪合作下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轉機。根據西義顯在回憶錄『悲劇之見證者』一書中敘述，從事鐵路營運的西義顯之所以投入和平工作，主要基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與滿鐵總裁松岡洋右之“誓約”。松岡洋右支付西義顯進行和平工作的費用，並為確保西義顯的行動自由，解除其原在滿鐵的職務（註三）。但西義顯強調，所獲得的工作費用不同於浪費國家秘密費用的特務工作費，應用範圍僅及於民間同志性質的活動之旅費和住宿費（註四）。松岡雖於一九三九年四月辭去滿鐵總裁，仍舊繼續在經濟上支援西義顯的和平工作。

西義顯將其告別“被歪曲”的汪兆銘「梅工作」後所展開的新工作，自稱為第二期和平工作。西義顯認為日本目前正處於歐戰爆發、中日問題尚未解決，卻面臨冒然加入世界大

註 二 西義顯『悲劇の証人』（東京、文獻會、一九六二年）頁二六六～二七〇。

註 三 同上、頁三一三。

註 四 同上、頁二五〇。

戰的危機狀態之中。然而，日本政府企圖依賴汪兆銘的“中央政權”，重關中日新關係來解決中日戰爭，此乃一項愚不可及的行爲。這種策略反而造成遠東地區併入世界大戰的禍端。因此，西義顯承認日本政府從事的汪兆銘中央政府設置工作爲既成事實，企圖在日本佔領區內以滿鐵調查部系統爲班底，組織調查·計劃的機構，作爲實質上引導中國人步向善政的行政機構（註五），以防止汪政權的傀儡化。於是他展開第二期和平工作之時，推薦滿鐵東亞研究所中國部主事（主任）土井章，代替西義顯擔任南京事務所所長（註六）。可見西義顯的和平工作構想，與滿鐵在華中擴張利權，有密切關係。

其次，西義顯必須找到代替高宗武充任“觸媒”的人選，他認爲張競立是適當對象。張競立與蔣介石年齡相仿又是同鄉。他自一橋商業高校畢業後，進入大清銀行，後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平綏鐵路局局長。一九三五年西義顯在南京任職時，張競立則是國民政府財政部司長。張競立與滿鐵的關係，可溯及清末。在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副總裁松岡洋右時代，中日展開的滄石鐵路交涉（一九二七年七月至翌年七月）之際，張競立擔任中國的交涉委員兼事務總長，與滿鐵的負責人松岡等有過談判的經驗。此外，西義顯就任後不久，又有隴海線火車頭招標問題。因西義顯獲得張競立與其堂兄弟盛沛東（鐵路部部長張公權的秘書）的幫忙，最後由滿鐵得標。因而，西義顯在南京任職時期最爲熟識且相互往來的二個中國朋友中，一個是中國銀行南京支店的經理吳震修，另一個則是張競立。對西義顯來說，在高宗武、吳震修離去後，張競立應將成爲極佳的“觸媒”。西義顯的計畫，是企圖透過張競立在中國鐵路方面的人際關係，來策動張公權，以達成直接對重慶政府，特別是對蔣介石的和平交涉（註七）。

西義顯正企圖策動張競立時，中國方面也趁機要張競立對西義顯展開人情遊說，以阻止日本建立汪兆銘的中央傀儡政權。此時，也正是中國的“宋子良”與日本參謀本部接觸，企圖瓦解汪政權樹立工作的時期。中國方面利用日本急於求和之心態，曾經擬定數條不同的謀略路線，試圖瓦解汪兆銘政權樹立工作。然而，西義顯則在結束與滿鐵的交涉且說服土井章之後，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程至上海，到了上海滿鐵事務所，才獲知連絡員盛沛東代替張

註 五 同上、頁二七三～四。

註 六 同上、頁二七五。

註 七 同上、頁二七六、二八四～二九四。

競立來訪等待西義顯消息一事。張競立爲了要推展和平工作，十一月中旬離開重慶到香港，也曾經親自到上海找西義顯會面。後張競立將會面一事交由盛沛東和沈恆處理，先行返港等待西義顯到香港來（註八）。於是翌年元旦，西義顯從廣東前往香港會合盛沛東和沈恆，一同訪問張競立。此時，西義顯始知張競立誤解他仍舊從事「梅工作」，想要阻擾日本的「汪兆銘工作」（註九）。張競立以中國“正統政權”的立場論述是非，並義正辭嚴地勸告西義顯應阻止汪組織偽政權（註一〇）。當時西義顯心中另有打算，願意與張競立保持關係，而且張競立也適時地在說明何以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未參與汪陣營的原因時，提及張發奎與雲南省省主席龍雲之弟盧漢將軍，同爲中國人的秘密結社「道社」之成員，並透露張競立個人也是「道社」幹部之一等內幕消息。西義顯衡量汪兆銘力量之薄弱與中國秘密結社「道社」實力後，反而對透過張競立尋找和平路線工作，產生極大信心（註一一）。

然而，張競立並未立即響應西義顯的誘引。他對西義顯欲引出張公權一事打了包票，但在提及有其他兼具權勢與實力的第三勢力者時，未言明該人士的姓名。西在回憶錄中說，這位就是錢永銘（註一二）。雖然如此，張競立對於道社的組織和成員鋪陳甚多，除張發奎、盧漢及張競立外，還包括當時來自馬尼拉曾經擔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上海「青幫」總管杜月笙、盧溝橋事變時擔任駐日大使的許世英、以及浙江第一財閥錢永銘。張競立說，道社的理事長是王正廷、幹事長張競立，但實際上的中心人物則是錢永銘。張競立在敘述時仍謹記「不得洩露結社的詳細實況」，卻絕口不談道社的重要內情（註一三）。西義顯在無法進一步了解內情的情況之下，仍舊不放棄任何誘和的機會，轉而對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產生興趣。因此，張競立承諾替西義顯連絡張發奎，但這條路線沒有下聞，不了了之（註一四）。此外，西義顯在香港停留期間，曾經透過盛沛東的關係訪問舊安福派要人李思浩，企圖說服他參與和平工作（註一五）。

註八 同上，頁二七五～八。
註九 同上，頁二七九、二八二。
註一〇 同上，頁二八〇～四。
註一一 同上，頁二八二～四。
註一二 同上，頁二八五。
註一三 同上，頁二九九～三〇三。
註一四 同上，頁二八五～六。
註一五 同上，頁二八六。

四月，西義顯再到香港，和平工作仍舊沒有任何進展，時間徒然流逝（註一六）。當時，日本的參謀本部展開的「桐工作」，由於遭受重慶方面在三月間利用“宋子良”所進行的延期與阻攔汪兆銘「中央政府“還都”南京」的謀略工作而告失敗。重慶方面在將陳公博等七十七人列為漢奸並發出緝捕令之後，所進行的謀略工作暫告一段落。於是，日本方面在樹立汪政權以前，利用謀略方式期與重慶政府達成停戰·和平的“事前合流”計畫失敗了。日本參謀本部「桐工作」成員，在汪蔣“事前合流”計劃失敗之後仍然不放棄，又以汪蔣“事後合流”為目標，四月中旬再次召開“宋子良”與鈴木卓爾的交涉。此時雖然日本方面約略已經察覺“宋子良”是冒名的藍衣社成員，但仍舊相信這個誘和路線可以直通重慶，因而與“宋子良”繼續進行交涉。

二、第二次近衛內閣松岡外相的誘和「原案」

四月，以“事後合流”為主要目標的「桐工作」，進行相當順利。六月初旬在澳門召開第二次預備會議。會中，重慶代表積極表明“反共討共立場”與蔣介石對日和平的意願。澳門會談決定蔣介石、汪兆銘、以及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三巨頭舉行「長沙會談」。「長沙會談」因為中日雙方對會談的地點、時間、手續等事宜，無法得到共識而難以定案。當時德國在歐洲戰況勢如破竹的勝利，一時之間，日本國內出現“趕上巴士”的呼聲，因此日軍中央急欲結束中日戰爭。日軍中央曾向負責「桐工作」當局指示，即使在條件上日本對中國有所讓步也要成功地舉行「長沙會談」，以求早日結束中日戰爭。於是，六月二十三日，下達「訓令」予鈴木中佐，指示日方從和談條件中剔除承認滿洲國和駐兵兩個條件。後於七月二十二日“宋子良”和鈴木會談，決定中日在八月初舉行「長沙板垣·蔣介石的停戰會議」。當時“宋子良”與鈴木兩人曾將決議內容，交換中·日文的「備忘錄」。日軍當時的態度是焦急地渴望即時停戰；相對地，重慶方面則乘機施展拖延戰術，屢次向日方提出難題，要求日本再做讓步。就在中國無意和談的情況之下，七月三十一日在港擔任直接談判人的鈴木中佐宣告和談失敗。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在八月十日、海軍於九月十日相繼確認「桐工作」的失敗。九月十九日，御前會議討論「三國同盟」時，日本的中

註一六 同上、頁三〇四。

中央政府也決定“暫時終止”「桐工作」。接著，十月八日，英國向日本知會「再開緬甸公路」。當天，日本陸軍就依大陸指第七五八號指示，正式結束「桐工作」（註一七）。

然而，西義顯與張競立的和平工作，經過半年多的觀望期之後，出現轉機。七月初，西義顯接獲滿鐵上海事務所的通報，得知盛沛東密訪東京的消息，因而西義顯的和平工作再度復甦（註一八）。據聞，盛沛東之所以訪日，是因為有“重要人物”即將自重慶到香港，所以張競立為催促西義顯再訪香港而特別派遣盛沛東訪日。盛沛東所說的“重要人物”，西義顯說就是浙江財閥巨頭交通銀行董事錢永銘。錢永銘是在上海四一二事件時，向蔣介石提供國民黨軍政資金，並協助發售二五庫券，之後便成為蔣介石的少數友人之一（註一九）。

於是，當西義顯重新開展和平工作之際，首先力邀兒玉季雄參與。兒玉是西義顯交往二十年的朋友，也是西義顯在一九三〇年加入滿鐵的關鍵人物。適時兒玉辭去中外商業新報政治部部長，賦閒在家，因而即刻接受西義顯的邀約同赴香港（註二〇）。此外，據西義顯說，出發前曾探問近衛第二次組閣的外相人選松岡洋右的意見。七月十六日米內光政內閣因反對三國同盟而遇陸軍倒閣運動，繼之組閣的是支持陸軍新體制的近衛文麿。近衛組閣時，力排眾議指名松岡洋右為外相（註二一）。西義顯說，「這對應香港之邀儘速前往的我而言，視松岡接任外相為既定的事實。我在充分確認過松岡基於總責的當局者立場向我表明如何推動中日事變處理的信念之後，從東京出發。」「因此我能以與先前不同的信心，面對張競立或錢永銘，而且，事實上如今我的身份已非一個在野的平民，我的言行不再被視為癡人的狂言」（註二二）。此刻的西義顯，欲假松岡洋右的“政治力”來達成對錢永銘的和平工作。

那麼，松岡外相到底給予西義顯何等指示？七月十九日近衛組閣之前，曾經在荻窪私宅會晤松岡外相、東條英機陸相、吉田善吾海相等人，召開四相會談。當時，松岡提出「我方

註一七 關於桐工作，請參照藤井志津枝前揭書第三章，頁一二七～一七五。

註一八 『悲劇の証人』，頁三〇五。

註一九 同上，頁三〇六～九。『舊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六〇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八六～八。

註二〇 『悲劇の証人』頁三〇五、四一〇。

註二一 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東京、TBSブリタニカ、一九七九年）頁一九九。岡義武『近衛文麿』（東京、岩波新書、一九七六年）頁一一九。

註二二 『悲劇の証人』頁三一二。

對支那事變與世界新形勢擬定方案」(松岡原案)。根據此方案,可以窺見松岡洋右對華誘和構想和世界戰略的梗概(註二三)。

首先,松岡主張強化日本經濟活動,作為主要內外施策的基本方針。在此前提之下,他認為「我國的經濟活動,必須重視純作戰地區之作戰軍作戰能力,故軍方絕對有其必要自行掌握其生存之權利」。因此其他方面則「一律由政府統籌領導,力求振作」。松岡此番話的目的,就是企圖將對華和平交涉的主控權自軍方收回,由外務省統一指揮。「松岡原案」第二項目,乃是「世界政策」,其重點有四:(一)日本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先強化與日德義軸心國關係,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並且在此東西策應下,遂行重要施策。(二)在日蘇關係上,與蘇簽定日滿蒙國境互不侵犯條約,其有效期間為五至十年,以求日本充實軍備。如此日蘇將來發生對壘時,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三)在東亞的英法荷殖民地方面,應將其列於日本的東亞新秩序之範圍,並隨機積極處理之。(四)日美關係上,儘量避免無必要的衝突。同時日本向美國說明日本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是必須且斷然排除他國的武力干涉。日本應毋庸顧忌美國,強力邁進之。

「松岡原案」第三項目,乃是「支那事變的處理」。這主要重點歸納為(一)日本採取徹底作戰及阻截援蔣勢力措施的同時,為達到該目的在中國內部進行政略性施策,作為輔助手段。(二)日本政府援助汪兆銘南京政府的方針不變,但是重慶政府如有與日和談的意願,則重慶政府必須同意以下三點:①具體實現東亞共同防衛計劃;②共同確立東亞經濟圈;③保證中日不開戰。另外,中日停戰後中國要重建新政權時,重慶方面必須向日本承諾尊重南京汪政府之意,並視南京汪政府為內政問題來妥善解決,否則中日無法達到停戰或和談的餘地。

「松岡原案」第四「整頓國內體制」項目,列舉有四大方針:①組成結合尊奉國體精神與全民一致的新政治組織;②為強化其政治力量,設置直屬總理大臣的決策機關;③設立戰時經營指導機構,以統御資源開發及生產之擴充·消費限制;④以統合官廳事務,改革經濟機構,全力發揮國內經濟力量,同時確保足以安定國民經濟的物資及物資分配上的公平。

四相在荻窪會議商議後,對「松岡原案」加以修正。如第二「世界政策」之中,在日本

註二三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八八年)頁三一九。『昭和研究会』頁一九九~二〇一。

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南進方向，加上東亞以外的「鄰近島嶼」。故其未來「南進領土」的範圍，從英法荷殖民地擴及到葡萄牙的殖民地，並且決定日本「排除列國會議」，拒絕西歐列強的干涉。在日美關係項目上，將日本「毋庸顧忌美國，強力邁進之」一詞，改成「貫徹方針的實現」之語，來強烈表達日本對南進的決心。在第三「支那事變處理」上，再添加“禁止排日”與“排除共產主義”二條件。再者，停戰後的新政府建立方面，日本對重慶要尊重南京汪政府的立場不變，但在兩政府妥善解決的有關『內政問題』用詞上，加上雙引號。其特別加上雙引號，乃是強調中國尊重日方意見，建立「蔣汪合流」的新中央政權之意。另外，為促進松岡外相路線之和平工作，要求南京政府大力支援對重慶政府的和平策動。至於第四的「整頓國內體制」，除了保留原有四項目外，再加上促進國外貿易與採取緩合日幣圈內的輸出限制，來確立國內物資供應體制的新項目（註二四）。

總之，修正松岡原案，即荻窪會議後的“決議”，正式於十一月十三日的御前會議中提出，為「支那事變處理要綱」（註二五）。這乃是對近衛首相所提倡的新體制運動，實質地附加更具體的內容，也可以說對第二次近衛內閣的軍國主義型法西斯體制確立基本方向。松岡外相以強化日德義三國同盟為今後日本的外交方針，取代了日本近代以來的日英同盟為主的外交方針，並決定南進政策，不惜與英美發生衝突。這樣的決定，將使日本陷入無法避免與英美開戰的命運。這也正反映，日本外務省與陸軍雙方意向一致所造成的結果。七月十二日外務省當局起草「日德義三國強化提攜案」，主要是提倡為對應歐洲新秩序，日本將南洋包含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之中，組成一個生存圈，並以具體實現緊密的東亞圈合作關係。並且日本為達成迫使英國屈服的目的是，應在東亞對美採取牽制手段，來阻止美國參與東西任何一方的戰場。在日蘇關係方面，則提倡兩國合作，以達日本的戰爭目的（註二六）。此外，「松岡原案」中所提及，以日軍作戰為優先，來確立戰時經濟體制的主張，無非助長陸軍對軍政之野心。曾因聽說米內光政就任首相即策動倒閣、企圖成立第二次近衛內閣的陸軍省軍務局長武藤章（註二七），預料陸軍不久將主導政權，故命令軍事課長岩畔豪雄研究並

註二四 同上，頁三一九～三二〇。

註二五 同上，頁三四二～三五二。

註二六 同上，頁三一八～九。

註二七 『昭和研究會』頁一九八～九。武藤章著・上法快男編『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錄』（東京、芙蓉書房、一九八一年）頁一六三。

起草國策方案（註二八）。岩畔於六月完成「總合國策十年計劃」第一案，此即七月二十六日由閣議決定「基本國策要領」之原型（註二九）。原本松岡打算從軍部取回外交權，再以新體制運動之名義，建立軍方除了作戰以外不得干政、由政府統一指導的外交模式，結果反而助長軍部介入政治以及對軍政的野心。

關於對華和平策略方面，在修正松岡原案後的四相荻窪會議的“決議”中，找不到任何讓步的項目，不同於在進行「桐工作」時的日本陸軍中央曾經有過願意讓步的跡象。可見基本上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並無改變，始終以戰勝國姿態提出要求。然而實際上，日軍早已在物量與軍事行動上陷入極限狀態，原本在一九四〇年欲乘德軍於歐洲戰場之優勢，與大藏省交涉預算中，擬定自一九四一年起自動從中國撤兵實施四年計劃。根據種村佐孝『大本營機密日誌』三月三十日的記載，可以窺見日軍當時的決定是：

「今天陸軍中央部根據參謀總部的提案，決定處理支那事變的重點。按照該項決定，倘若昭和十五年仍無法解決支那事變，即自十六年逐次由支那撤兵，十八年為止，將駐兵縮小到上海的三角地區和蒙疆一帶。……此為處理支那事變的一大轉變。……該項會議在參謀本部會議室舉行，出席者包括參謀本部參謀總長閑院宮、參謀次長澤田茂、總務部長神田正種、第一部長富永恭次、第二部長土橋勇逸、第三部長鈴木宗作、陸軍省陸軍大臣畑俊六、陸軍次官阿南惟幾、軍務局長武藤章」。（註三〇）

然而，該『日誌』五月十日的記載，又可得知當時日本政府決定「南進」施策之內幕：

「僅在二個月前，亦即三月三十日，大本營仍專注於支那事變的處理上，並決定昭和十六年開始逐步撤兵。結果，不知何時開始，大本營忘卻支那事變的處理事宜，反轉為當時盛行的趕搭巴士之想法，終而急轉為南進論。時序進入六月，參謀本部即考慮南方作戰，陸續派遣作戰・情報人員赴菲律賓、馬尼拉、法屬印度、泰國、蘇門答臘、爪哇、新幾內亞等國偵察。當然此等人員護照上的身份，均為一般公司的行員。自此南方始成為參謀總部的研究對象。之前參謀本部與軍令部所擬定的年度作戰計劃裡，關於對

註二八 『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錄』頁一六四。『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戰外交史』別卷、頁三〇六～三一五。

註二九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戰外交史』別卷、頁三二〇～一。

註三〇 種村佐孝『大本營機密日誌』（東京、芙蓉書房、一九七九年）頁三二。

英美模擬戰，僅出現登陸呂宋島的可能性措施而已；至於其他南洋地區，則連偵察都沒有，可見當時陸軍對呂宋之外的地區缺乏關心，也沒有臨時作戰的計畫和準備。由於作戰首須編輯軍要地誌，因此軍方急速派遣偵察人員赴南方各地，著手蒐集編輯兵要地誌的資料。此外，因陸軍向海軍軍令部要求提供多年蒐集的南方資料，雙方因此發生磨擦」。（註三一）

儘管內部紛擾，在七月二十七日大本營和政府連絡會議仍然決定「順應世界情勢之時局處理要綱」。要綱中，以「方針」及「要領」，明示「解決支那事變」與「南方施策」之相互關係，尤其是「關於支那事變未完結前之南方施策」，「將原處理支那事變之工作重心，轉移至南方上」的決定（註三二），就是將放棄過去一直為解決中日戰爭所施展的對華政策的努力，改為由新的「南方施策」，企圖阻截英美等國家對蔣援助的途徑，斷絕重慶政府的生命線，達成屈服重慶政府的目的。如此一來，即使西義顯在其回憶錄中強調，自己是如何基於個人之熱情，為實現中日兩國和平而奔走，但只要背後有第二次近衛內閣外相松岡此一“政治力”存在，西義顯也無法辯解其和平工作所背負的國家主義色彩。換言之，日本政府決議將對華政策重點置於阻截英美援蔣之上，而對華誘和策略視為其「輔助手段」，並採取誘和工作與汪政權同時施展推動。因而，無論西義顯如何強調其和平工作乃是出自於個人一片赤誠，也很難自圓其說。畢竟，他不過是外務省松岡洋右外相對華外交「謀略」中的一個棋子而已。

三、「錢永銘工作」的開始

應盛沛東的迎接，匆匆前往香港的西義顯，在八月二十四日會見錢永銘。雙方在香港九龍錢宅，於二十七日進行第四次會談時，錢永銘終於允諾參與和平工作。西義顯在回憶錄中記載，錢永銘當時提出三項和平條件：

- (一)重慶·南京兩政府合併，建立一個名符其實的中國統一政府。
- (二)日本政府以中國的新統一政府為談判對手，從中國全面撤退為推行日華戰爭所派遣

註三一 同上、頁三三～四。

註三二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二二～五。

的全部兵力。

實施撤兵的具體技術條件，首先應參照締結的停戰協定辦理。

(三)日本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締結防守同盟。

不過，得把特定國從這個同盟的對象中排除（註三三）。

所謂的「特定國」，根據西義顯的說明是指美國而言。再者，關於第一項條件，錢永銘對西義顯解釋說，汪兆銘之事乃是中國內政問題，日本毋需插手（註三四），企圖阻撓日本「蔣汪合流」之用意。然對日本來說，重慶所提汪政權為“內政問題”處理一事，也剛好合乎日本的排除歐美干涉的意圖。錢永銘為確認日本政府的和平意願，決定派遣張競立為正代表、盛沛東為副代表赴日。八月三十一日代表錢永銘的和談一行人，隨西義顯和兒玉季雄，搭船離開香港。航行約二週後，西、張、盛三人中途於上海下船，餘兒玉一人獨自返日。根據西義顯說，張、盛二人是為取得出國簽證而在上海下船，西是為了獲得汪兆銘之事前諒解，因而將張、盛留置上海等候，隻身前往南京（註三五）。西義顯此一舉動與前述四相荻窪會議中，為增進和重慶間圖謀和平機會，策動南京政府這一“決議”（註三六）不謀而合。西雖藉口說是為獲得汪兆銘與周佛海諒解而前往南京會面（註三七），但是實際上是為其和平工作鍍金，以便說服松岡。西義顯前往南京取得周佛海的二件文書，即①以南京政府的立場，答應由錢永銘與重慶政府交涉之委託書，及②致松岡推薦張競立之介紹書（註三八）。西義顯謂其後西一行人於上海江灣機場離境至福岡雁巢機場，後搭火車前往東京，抵達時大約是九月十七日傍晚，西將張競立安置於帝國飯店，隨即奔赴千駄谷外相的私邸，詳細說明工作的始末。

根據上述西義顯回憶錄中所言，當時留在上海的張競立等人，對西前往南京一事，全然不知情，也未與南京政府當局接觸。實則不然，周佛海並不完全信任西義顯，自行前往上海與張競立等人會面，在九月九日至十五日（除去十三、十四兩日）連日會商，最後決議派張

註三三 【悲劇の証人】頁三三八～九。

註三四 同上、頁三四三。

註三五 同上、頁三三八～三四三。

註三六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一九。

註三七 【悲劇の証人】頁三四四～五。

註三八 同上、頁三四六。

競立赴日。

根據『周佛海日記』九月六日的記載「（下午）五點，協（陳）公博謁見汪先生，承汪先生告以西（義顯）赴港與錢永銘接洽經過。據云錢表示，寧渝合作，渠可負責促成，並謂周作民可代表渠與我方接洽，再行赴日等語。西之言是否可靠，抑俟余赴滬與西同見錢之張競立談，然後再為處置」（註三九）。可見周佛海一開始即對西義顯的話抱持懷疑。翌（七）日的日記上記載：「七時起。西來談，旋與西及影佐（禎昭）謁汪先生，商與錢連絡。影佐意，關於停戰，即有宋子良與今井接洽，無論其可靠與否，但於其確實失敗之前，無論日本及我方，均似可任其接洽，不宜與之爭做，故吾輩今天只與錢談寧渝合作及和平條件問題之。汪先生甚以為然」（註四〇）。由此可見西義顯在進行「錢永銘工作」前，不僅需要獲得汪兆銘的同意，更重要的是與日軍梅工作的負責人達成協議。於是周佛海為會見錢永銘之代表並謀求雙方達成協議細目，決定於八日前往上海。

九月九日張競立會同西義顯訪晤周佛海，張競立向周佛海說明錢永銘係為實現中日兩國和平並促成重慶·南京合作而竭盡心力，三人會談並涉及“宋子良”·今井的交涉事項。周佛海在日記中說「余對此事本斷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確」（註四一）。是夜，西、張、盛等「錢永銘和平工作群」與影佐禎昭、周作民會談。翌日上午，西等即向周佛海報告昨夜會談結果，並雙方繼續討論日後進行方策。「新之（錢永銘）及作民請將和平條件見示渠等，可向重慶進言；惟日方以重慶無絲毫和平表示，不能即示和平條件。彼此均有理由，甚難解決也。」（註四二）周佛海顯得極為憂心。下午，周佛海與影佐禎昭談及有關「“宋子良”工作」情形，知道該工作目前正由於重慶方面指責近衛致蔣介石的親筆函內容空洞，蔣介石有可能拒絕回信。他認為「此事余始終認為日方為渝方面所戲弄，恐難成功也。」（註四三）隨後周佛海會見李北濤，請李回香港勸請錢永銘為和平工作奔走，同時向錢詳細說明日本的政情及南京政府方面的態度（註四四）。李北濤為交通銀行

註三九 蔡德金編『周佛海日記』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三六七。

註四〇 同上，頁三六七～八。

註四一 同上，頁三六八～九。

註四二 同上，頁三六九。

註四三 同上。

註四四 同上。

總行的秘書，是錢永銘的部下。周佛海在九月九日當天的日記中透露內心的無奈，說「連日爲全面和平努力，希望能有成就，但實際困難甚多，不易成功，奈何」（註四五）。

十一日夜，周佛海與周作民、張競立、盛沛東，就全面和平問題洽談二小時。周佛海說「余對此殊悲觀，蓋重慶主日本撤兵再講和；日方只與重慶談停戰，至講和，則以南京國民政府爲對象。雙方距離太遠，且均打官話，故一時恐不易接近也」（註四六）。周在日記中述及個人想法「東京空氣余早以知之，所不知者，蔣先生方寸中事耳。國家存亡繫於一人，實非國家之福也」（註四七）。翌（十二）日，周佛海會見西義顯討論全面和平事項時，說「余告以蔣（介石）爲事實上之獨裁者，重慶無人能在蔣前暢所欲言。錢新之有此資格，渠爲蔣老友，故能如此，但決無使蔣採納其意見之力量」（註四八）。周佛海繼而針對甫於八月底終結的中日條約交涉問題批判日本，說「全面和平難期，因重慶自以爲未戰敗也。」（註四九）暗示西義顯的和平工作前途黯淡。但仍於十五日下午會見張競立。張即將於十七日出發前往日本，因此要求周佛海準備致近衛、松岡的親筆函，並且雙方約定十月五、六日張競立自日本返國時，在上海再會商（註五〇）。西義顯向周佛海要求致松岡的親筆函是在十六日（註五一），而致近衛的親筆函則爲十七日下午（註五二）。西義顯於回憶錄中記述，由南京政府方面取得的推薦信函、一行人搭機訪日、以及繼續乘坐地方火車等記載（註五三），應屬虛言。因爲根據周佛海的日記，張一行人是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即西由周佛海取得致近衛的親筆函後，始搭軍用飛機前往日本，不然西不可能在十七日當夜訪問東京的松岡外相。西義顯之所以不願意在回憶錄中記錄他與軍方人員商談的過程，以及和中國方面張競立與周佛海等接觸商談的事實，是他希望保持反對「梅工作」的立場、以純民間人士的身份留下記錄之故。

九月十七日夜，張競立、盛沛東抵達東京住進帝國飯店後，西義顯即前去拜訪松岡外

註四五 同上。

註四六 同上、頁三七〇。

註四七 同上。

註四八 同上、頁三七〇～一。

註四九 同上、頁三七一。

註五〇 同上、頁三七二。

註五一 同上、頁三七三。

註五二 同上。

註五三 【悲劇の証人】頁三四七。

相，向松岡報告張競立訪日的經過，並提出周佛海代替汪兆銘寫給致日本外相的親筆信函，而極力說服松岡。西義顯的勸說奏效，松岡向西表示他明日將赴葉山覲見天皇，因此命令西備妥錢永銘與道社有關的上奏稿（註五四）。西義顯即於翌日下午引領張競立、盛沛東前往外相官邸拜訪。西向松岡交付上奏稿，張則提出錢永銘的和平條件（註五五）。然而，當時的松岡表現地相當怪異，會談中並未給予中國方面的代表發言的機會，也迴避涉及錢永銘的和平條件，因此張競立無法得知松岡的真正意向。當時松岡基於三國同盟的立場賭注日本未來的國運，不願讓中國方面得知日本真正的用意。因此，松岡在十八日第一次會談後，就將張競立等人送往箱根，讓兒玉季雄陪伴到處遊山玩水（註五六）。然而，西義顯則在這期間奉松岡之命，在帝國飯店待命，以備隨時接受傳呼應訊（註五七）。第二次松岡與張競立會談，是等十月一日海陸外三相達成「對重慶交涉和平事項」決議後，始於次（二）日進行。松岡外相告知張競立，他已於錢永銘仲介條件書上署名，並無條件地信任錢永銘（註五八）。但是，松岡向西義顯要求，該和平工作必須在二個星期之內，亦即十月三十日之前完成。西和張競立一行，搭乘參謀本部的特別運輸機回上海（註五九），根據周佛海日記，張等一行人係於十月十六日抵達上海（註六〇）。

四、晉升為日本外務省和平工作的「錢永銘工作」

根據十月一日陸海外三相會議中所決定的「對重慶交涉和平工作事項」和「附件：第一項日本方面要求條件試案」，可以了解日本對於「錢永銘工作」的謀略方針。

在「對重慶交涉和平事項」中的第一項，表明日本與重慶之間的和平交涉必須依照日本與南京政府之間所達成的基本條約（包括海南島的相關秘密協定）為基準。並且在「附件」中列有下面五項要求，具體說明日本方面的立場：

註五四 同上、頁三四九。
註五五 同上、頁三五〇～二。
註五六 同上、頁三五二～五。
註五七 同上、頁三五五。
註五八 同上、頁三六二。
註五九 同上。
註六〇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三九二。

(一)承認滿州國（但視情形採其他途徑達成協議也可）。

(二)放棄抗日政策、中日共同防衛東亞。

(三)基於共同防衛東亞，承認日本在華駐軍。

①派遣軍隊屯駐蒙古、新疆及華北三省，以確保共同防共。

②承認船艦部隊駐留海南島及華南沿岸特定地區，以確保中國沿岸海上航行的安全。

(四)承認日本為國防上的需要，在中國從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五)承認長江下游三角地帶的限期駐軍（但視情況取捨）。

除以上五條件外，另外在「附件」中，以「註記」列舉三個必須要「實質貫徹」的項目：

(一)談汪兆銘及蔣介石兩政權合作時，必須尊重日本的立場，並視其合作為內政問題處理。

(二)具體實現中日兩國密切的經濟合作關係。日本是基於平等原則，在形式上盡力尊重且維護中國的尊嚴。

(三)關於調整經濟現狀，必須深思熟慮，以避免中日雙方經濟均陷入混亂。（註六一）

在「對重慶交涉和平事項」第二項中，日本與重慶之間的和談，是以實施「汪蔣合作」和日本・重慶直接交涉為原則，並本項交涉必須於十月中獲得實效。若於十月中無法達成目標，即把重點移轉至對德蘇的施策上，並按照預定計劃，日本正式承認汪兆銘政府。可見日本展開錢永銘工作時，曾考慮過“打德國牌”（註六二），以從旁協助中日和談，或藉此調整對蘇國交，以達牽制重慶的目的。但是，日本早已有意暫時以「錢永銘工作」作為直接對重慶謀略的最後和平工作，決心締結日德義三國同盟（九月二十七日）來對抗英美，朝向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路邁進。

日本外務省之所以會立即同意西義顯，以錢永銘為仲介的直接對重慶的和平工作，事實上，是因為外務省東亞局第一課長太田一郎在九月五日就已提出對重慶直接和平工作構想，其中並考慮過藉由周作民、錢永銘、張季鸞及頭山滿來進行的可行性。太田案比十月一日的

註六一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〇二～三。

註六二 【初期陸軍作戰（三）：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印局印「日軍對華作戰記要」叢書三、一九八七年）頁四一三～四。

修正「松岡原案」的荻窪四相會議「決議」，條件較為寬鬆，可以說許多妥協施策項目，均列入和平條件之中。特別是有不強求蔣介石下台一項。再者，太田案雖未明列中日停戰及日軍撤退事項，卻將中國暫時分割為國、共、汪三地區，以確立一般治安為優先等，算是日方對重慶政府的妥協事項（註六三）。但是，由十月一日修正「松岡原案」的荻窪四相會議的“決議”內容來看，日本絕對無意讓步。可見「錢永銘工作」只不過是外務省代替軍部對重慶施展的另一個和平謀略罷了。

在這種日本政府擬定強硬措施的情況之下，和平捐客西義顯其任務，如同他在「梅工作」初期負責引誘高宗武，經情義說服成功後，再由參謀本部影佐禎昭交接一般，扮演仲介角色。此次西義顯又開關對重慶的直接誘和工作時，他的任務也僅限於說服錢永銘的捐客角色，其後他把錢永銘工作委由外務大臣派遣的正式代表來接手，進行正式交涉。這一次外務省派遣前香港領事田尻愛義為正式代表，他曾經參與「梅工作」時，即在香港待命，以備庇護汪兆銘，此次即以駐華（南京汪政府）大使館參事官的身份擔任外相的正式代表前往香港（註六四）。另外，為加強錢永銘的說服工作，前上海總領事、曾在盧溝橋事變時接受外務省指令，在上海展開對華和平工作的錢永銘舊友船津辰一郎也一併參加（註六五）。同盟通信社松本重治，也為了說服周作民也加入錢工作群（註六六）。松本是曾在西義顯引誘高宗武工作中，以口頭約定「日本絕不會害你變成漢奸」，來促成高宗武的訪日與汪方·參謀本部之間的牽線角色。當時松本認為汪兆銘談和工作，移花接木成為參謀本部的謀略較為妥當。周作民是浙江財閥系統金城銀行董事長，當時他仍居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內（註六七）。

當日本政府開始著手「桐工作」，展開對重慶直接和談交涉之際，就對承認南京汪政權採取任意性延緩政策，以圖引誘蔣介石。在「錢永銘工作」當中也不例外。南京當局又在日本進行「錢永銘工作」時，面臨同樣充作引誘獵物餌食命運。另外，對重慶直接交涉的「桐

註六三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第四卷・中日戰爭（下）（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六三年）頁二三九～二四〇。

註六四 『悲劇の証人』頁三六一。

註六五 同上、頁三六二。

註六六 同上、頁三六五。

註六七 『舊上海的金融界』頁一六二。『悲劇の証人』頁三六三。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天津、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一七四。

工作」已宣告失敗，日本應該了解重慶無意與日本協議和平。周佛海對日本政府再度計劃對重慶的和平工作，又一再拖延承認汪兆銘政權一事，深感不滿。周佛海在十月二日聽說影佐禎昭、日高信六郎明日將回國，因此向二位傳達請求日本政府強化對南京政府援助之意（註六八）。十月十三日則委託將返日的清水董三書記官，帶回致松岡外相的書信，表示「張競立工作只能做全面和平之準備，萬不可因此變更既定步驟」（註六九）。周佛海對日本的不滿，可以說是千頭萬緒。當周佛海聽聞松岡即將就任外相的消息時，就說「那個人言大而誇，未知近衛何以選渠也？」（註七〇）對松岡非但没有好感，對於三國同盟也給與負面評價（註七一）。有這種觀感的中國人，不僅是周佛海一個，甚至可以說那些響應日本「和平工作」、並以「實現模範和平地區」為口號，脫離重慶抗日陣營的中國人，都一致對日本視其為傀儡極為不滿。周佛海曾向影佐禎昭等日本人，對日本政府不肯承認南京政府表達個人的不滿，並認為無法實現和平，其責任在於將南京政府貶為傀儡的日本。例如在八月二十八日「日華基本條約」交涉當天的近衛聲明中，周佛海即針對聲明條文中載有「日支滿蒙」四個字，加以批評，說「承認滿州國就已經忍痛，如將蒙古又成一國，實非吾人所能忍受」（註七二）。

十月十六日影佐禎昭會同陳公博和周佛海會見汪兆銘。影佐向汪表示日方正與重慶交涉和談，因此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日期，多少會有延遲。當天下午，西義顯、張競立與盛沛東一行人，在日本整整停留一個月之後，隨同松本重治抵達南京。周佛海和西義顯一行三人會談三個小時後，周佛海答應盡力全面協助「錢永銘工作」，但仍向他們提醒，強調重慶方面並無和談意願，以及汪蔣合作的關鍵仍在於重慶手中等事。西義顯則請求周佛海敦促周作民同赴香港，協助和談工作。該夜，周佛海、陳公博與汪兆銘洽談後，決定派周佛海、陳公博二人同去上海（註七三），說服周作民與西義顯等人共赴香港，並要求周作民代表南京政府，會同錢新之前往重慶，勸說重慶與日和談。結果，周作民應允香港之行，但直言成功的

註六八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三八四。

註六九 同上、頁三九一。

註七〇 同上、頁三四〇。

註七一 同上、頁三七九、三八一。

註七二 同上、頁三六二。

註七三 同上、頁三九二。

機會渺茫（註七四）。日人上田省一亦於十月二十日，對周佛海預測「松岡擬以錢永銘之線索進行全面和平，必遭失敗，周作民此行必無結果」（註七五）。

西義顯回憶錄中說明一行人赴港有所延誤，是因為松本重治和張競立勸請周作民加入和平工作耽擱太多時間，因此西義顯和田尻愛義抵達香港時是十月二十日，張競立與盛沛東是二十二日，船津辰一郎與兒玉季雄是二十四日，周作民則在二十六日才抵達香港（註七六）。然而，根據周佛海的日記，因為日方與南京政府方面，委周作民攜帶對重慶和平條件信函一事，進行商談而延誤行程。周佛海日記十月十九日記載「松本（重治）來，示託周作民帶赴重慶之和平條件。細閱內容，與在京（南京）所談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減為一年；蒙疆及華北特定地點駐兵，雖形式略異，實質完全相同」（註七七）。可見，甚至連南京政府託周作民攜帶到重慶的書信，都是由日本方面事先準備的。

在香港方面，二個多月以來一直等待張競立赴日後回報消息的錢永銘，早已失卻為中日和談做媒介的意願。因為日本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底締結三國同盟，以及西義顯不與錢永銘先商談卻逕赴南京與周佛海等汪方人士接觸，再加上與訪日的張競立失去聯絡等諸多原因，致使在香港的錢永銘相當不悅。於是，西義顯動員所有新加入和談勸說者，如周作民、船津辰一郎等人，促請錢永銘出面幫忙。根據西義顯的記載，勸說奏效，錢永銘於十一月二日決定派遣使者前往重慶。此使者將攜帶錢永銘呈蔣介石親筆函、松岡外相簽名承諾的錢仲介條件的文書、以及周作民委託張群向蔣介石勸說的信函與向吳鼎昌請求協助的書信（註七八）。當然，其中也包括那封經周佛海同意、由松本重治擬成、要求日軍一年內退兵為條件的周作民書信。

五、「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的謀略？

「錢永銘工作」一開始，汪兆銘方面的立場，極為微妙。一方面必須協助推展「錢永銘工作」，一方面又必須堅守立場，以確保其政權的鞏固。周佛海於十月十八日與松本重治會

註七四 同上、頁三九四。

註七五 同上、頁三九五。

註七六 『悲劇の証人』頁三六七。

註七七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三九四。

註七八 『悲劇の証人』頁三六八～三七一。

談後，在日記中透露這種矛盾心理。當天，松本重治在討論日華基本條約及汪兆銘政府的承認問題時，表示「最好先承認後簽約」，周佛海也表示贊同松本的意見，說「余謂此為合理之辦法，余前亦有此議，未蒙通過。大約日方以談判條約延遲承認，以待重慶之全面和平」（註七九）。他又想到「桐工作」時南京所背負的負擔與不滿，就接著說「余等亦明知此意，但因希望全面和平心切，故照日方提議步驟進行」（註八〇）。暗示他不得不再度全面協助「錢永銘工作」的矛盾心態。此刻的周佛海，雖然決心絕不設立傀儡性的中央儲備銀行，但卻不由自主，過著聽天由命的無奈日子，扮演著毫無期望的傀儡角色。

對「錢永銘工作」不抱任何期望的人，不僅是周佛海，另有參謀本部的「桐工作」人員，以及向來推動南京政府設立工作的「梅工作」成員。他們不再參與「錢永銘工作」，而致力推動南京政府的正式承認問題。十月二十七日周佛海在日記中記述「日高參事官來談東京近情，並謂日方望汪先生為正式首席，不必代理。」（註八一）轉達日本正式承認汪兆銘政權的最新態度。該夜，周佛海即與陳公博談論此事，決定於總理紀念日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委員會，修正國府組織及推薦主席等事宜。陳公博一直贊成汪兆銘就任國府主席，周也說「余本不贊成，以留寧渝合作餘地，今重慶既無意言和，原改組派同志及友邦都主張甚力，余無力阻止矣。」（註八二）為自己留下辯解的記錄，但後又說「今形勢如此，反不如提早舉行之為妙也」（註八三），大表贊同之意。

然而，日本政府當局為配合在香港進行的「錢永銘工作」，又想取消對南京政權的前次口頭承諾。十一月六日犬養健來訪，談論香港的消息，告知周佛海說「錢新之、周作民均未赴渝，只派人將方案送去」（註八四）。周佛海說「余處日前亦得此消息，惟未知所派者是否杜月笙也」（註八五）。周佛海是根據錢永銘與杜月笙與蔣介石的親密關係，推測使者應該是杜月笙。錢永銘和杜月笙，是上海黑白兩道的代表人物。錢、杜兩人關係非常密切，杜月笙之得以設立中匯銀行，晉升銀行和實業界，是透過錢永銘的指點（註八六）。且此二人

註八一 同上、頁三九八。

註八二 同上。

註八三 同上。

註八四 同上、頁四〇三~四。

註八五 同上。

註八六 徐成『杜月笙正傳』（台北、當代人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五六~七。

均曾在蔣介石北伐進駐上海之際，協助蔣反共肅清策略，對蔣在上海一帶的勢力培養有極大貢獻。盧溝橋事變後，兩人前往香港居住，而杜月笙在香港以蔣介石個人駐港代表之身份，參與機密工作，例如在一九四〇年初，高宗武和陶希聖脫離汪兆銘陣營及暴露日汪密約事件，都與杜月笙的從中勸告與活動有極大的關係。而後高宗武赴美時，杜月笙奉蔣介石之命給高宗武五萬美元（註八七）。因此，可以說杜月笙和錢永銘皆與蔣介石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所以周佛海猜測使者若是杜月笙，那麼這條路和平交涉路線即具高度可行性。

當天，犬養健接著又向周佛海說明，「東京友人對渝尚存若干希望，盼十二日暫緩推舉主席」（註八八）。犬養個人雖然也反對日方這個決定，但也無可奈何。周佛海回答說「此事余自始即不贊成，延期亦未始不可也」。於是九日周佛海隨同陳公博會見汪兆銘，傳達日本有意暫時中止汪就任主席的決定，並決定由南京汪政府的立場，在尚未與日正式簽字以前，打電報給重慶政府，嘗試最後一次的和平勸告（註八九）。汪兆銘原本在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卸除代理主席正式就任正主席。根據西義顯回憶錄，在港的西義顯從同盟通信得知此事後，打電報給松岡外相，展開對汪就任主席的反對運動而將此事中止，但西義顯卻激怒影佐禎昭。但是從西義顯推動「錢永銘工作」角度來看，汪未就任正主席是好事，可催促錢永銘向重慶展開第二次勸告的動機，是值得肯定的（註九〇）。果然，據說在十一月十二日，由張群代筆的蔣函終於送達到香港的錢永銘處。西義顯所記載的該書信內容，是「從東京外務權責當局發函，向主席表達意願，是全無前例的。我對松岡外相之誠意，甚感欽佩」（註九一）。於是，西義顯對「錢永銘工作」，愈加有信心。

相對於西義顯的滿心期待，南京的周佛海，此後將「錢永銘工作」與汪兆銘政權承認問題，視為唇齒關係，故他對該工作顯示出超乎尋常的關切。十一月十一日周佛海日記記載「八時起。訪影佐，談錢新之等在港接洽情形。據云八日致影佐電稱，錢七日接渝電，日方條件已於五日交蔣先生，蔣允考慮，三日後答覆；錢及周作民以此為最後唯一之時機，再

註八七 同上、頁一〇三～一一〇。

註八八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四〇四。

註八九 同上、頁四〇四～五。

註九〇 『悲劇の証人』頁三七五。

註九一 同上、頁三七一～二。

電蔣催促表示。」(註九二)錢永銘與周佛海致蔣介石的催促電文，在時間上，剛好是汪兆銘就任主席被中止的時候。不過，周佛海仍然與影佐商議條約的簽字、南京政府的改組及承認問題。當周佛海從影佐口中獲得條約已上達樞密院，且在二十日左右完成審議，在月底可完成簽署的消息時，再度滿懷希望地表示，「盼於月底前國府改組」(註九三)，藉以聊慰他對「錢永銘工作」的憂慮。

對周佛海來說，好不容易才結束「桐工作」，如今又要面對汪兆銘南京政府承認工作與「錢永銘工作」競爭的困境。周佛海內心的憂慮，正是負責「梅工作」的影佐最擔心的事。十一月十四日影佐禎昭訪問周佛海時表示，為催促東京當局對汪兆銘政權之承認，以及強化中央銀行，他計劃要陪伴周佛海訪日(註九四)。然而，周佛海訪日之前，最感興趣的，卻是在收集有關「錢永銘“誘和”工作」方面的情報。十六日周佛海日記中記述「聞作民已赴渝，豈蔣有意和平耶？果爾，是如天之福也」(註九五)。但在十七日周佛海日記中卻說「金城銀行頃已得電，作民今日由港動身，十九日可抵滬。是則赴渝之說，完全子虛，並可證明渝方並無和意。故渠不願在港久候也」(註九六)。周佛海懷疑日方所提供的消息，而根據他個人的情報來源，評斷香港「錢永銘工作」將要面臨失敗的命運。因為周佛海又獲“蔣無和意”的印証。

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間周佛海在東京展開活動，拜會近衛首相、東條陸相、河田烈藏相等日本政府當局的負責人，並與曾參與「梅工作」的故友歡聚，但是周佛海最關心的話題，不外乎是收集「錢永銘工作」的相關情報。十一月二十一日周佛海與近衛會談後返回寓所，「影佐、犬養來，談重慶方面已有回信，對於張競立所帶回的松岡條件，原則上贊同，並盼勿承認國民政府。因此，松岡有延期一週或十日意。影佐等認為不對，主張三十日定簽字，並詢余意。余告以所得材料太少，不能據以判斷，囑其再探詢詳細情形再說」(註九七)。當天晚上，周佛海赴外務省東亞局長山本熊一、該局第一課長太田一郎之宴。因為該

註九二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四〇六。

註九三 同上。

註九四 同上、頁四〇八。

註九五 同上、頁四〇九。

註九六 同上。

註九七 同上、頁四一一～二。

宴僅此三人在座，故周佛海在日記中說「三人談甚詳」（註九八），而不記載「詳談」之內容。但是，該宴也是周佛海收集有關錢永銘工作情報的重要活動，說不定他有機會閱讀到「二十一日田尻電文」內容。翌（二十二）日深夜，周佛海與影佐交換情報。「影佐來，謂渝方於十八日派員到港晤錢永銘，表示日方不可承認國府；錢於十九日晚，訪田尻，故松岡接田尻電後，信渝方有和意，擬延期承認；渠與阿部（信行）大使力爭。余告以錢致蔣緘，五日即送到，直至周作民離港，尚未回信，十八日忽派人來港，定悉知余來日策動承認，故以此破壞，蓋上海十五日晚報即載余來日也。影佐甚以為然。詢以所派何人，渠亦不知」（註九九）。可見二十一日田尻電，對日本決策當局發揮了直接的殺傷力。而這對周佛海來說，在南京政府承認問題上，又再度遭受阻礙。

但經二十一日深夜他與日本外務省當局詳談，並從中收集日方所進行有關「錢永銘工作」情報之後，於二十二日他以肯定的語氣，說「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無意與日和談”，卻藉機向日施展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壞”陰謀活動。

翌（二十三）日，周佛海從昔日「桐工作」日本方面代表之一的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白井茂樹大佐，獲悉周作民尚未回到上海，且發自田尻的電報敘述情況相當樂觀等有關「錢永銘工作」的消息。但是，周佛海持懷疑態度，認為日本對中國理解不足、情報也多半不正確，無法全然信任日本人，「白井所談，恐仍系空中樓閣也」（註一〇〇）。果然，二十四日下午，周佛海接到陳公博拍來的電報，得知周作民早在十九日就已經回到上海，在他離開香港的十七日時並未收到重慶方面的回函。於是，周佛海肯定地說「十八日派人到港之說，恐亦如周末返滬之情報同樣之不確實」（註一〇一），斷定日方所獲的情報都屬錯誤的。周隨即向影佐顯示陳公博函電內容，並在下午三點，兩人一同前往探望卧病在床的松岡，向松岡說明南京方面致力於全面和平的經過，以及重慶方面無意和談的原因。松岡向周佛海表明擁護汪方的經過，並承諾御前會議召開時力主三十日的簽署，但他不忘附加條件，向周佛海解釋如果外務省獲知重慶方面有意和談時，將與汪兆銘商議延期簽約一事。周佛海當場向松岡表

註九八 同上。

註九九 同上、頁四一三。

註一〇〇 同上、頁四一三~四。

註一〇一 同上、頁四一四。

示贊成，但仍舊不忘警告日方「惟恐中重慶拖延之計」（註一〇二）。周佛海以婉轉的語氣向松岡暗示，外相一廂情願進行的「錢永銘工作」，結局終究無法逃脫“中計”的命運。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佛海回到上海。當夜即與周作民見面。原來松岡、錢、周作民給蔣介石的書信，並非如日本方面所傳言是由重慶的要人親呈蔣介石，而是轉託有事停留在香港的金城銀行重慶分行經理戴自牧攜回重慶，並非由錢、周面呈蔣介石的。而且錢永銘對此事沒有興趣，周作民原本也打算儘快返回上海，但為船津所挽留。周佛海在日記中流露此刻淪落為“漢奸”，內心懊悔不已的心情。他說「足見日方前此所傳，均與事實不符。日方如此認識不足，又何怪發生此次事變。即今後合作，恐因此亦不易順利」。周佛海聽取周作民報告，完全知曉「錢永銘工作」真相之後，立刻通知犬養健，並叫他迅速打電報給日本的影佐傳達消息。同時，與汪方人士商談，無論如何堅持改組南京政府，使汪兆銘早日就任主席，並決定向日方提出嚴正要求，早日正式承認汪政府（註一〇三）。

六、三國同盟和「錢永銘工作」的失敗

儘管西義顯對「錢永銘工作」信心十足，然而最終還是如當初所預測般失敗。

首先是後期「錢永銘工作」在一九四〇年秋天發端之際，適逢日本內閣決定與德、義締結三國同盟。三國同盟，過去在第一次近衛、平沼及米內等三代內閣中一直懸而未決，然到了第二次近衛內閣時，松岡接外相後，才順利定案。松岡認為三國同盟是阻止美國參戰、引導日本至有利的狀況、實現大東亞共榮圈，並使國際均勢的外交良方。這種對美強硬姿態，迫使基於物資考量堅拒對美開戰的吉田海相辭職（註一〇四）。天皇也在九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半，以沉重的表情向結束閣議後進宮上奏的近衛首相詢問「事情演變至此實非得已，總理大臣在此重大時期，願與朕同甘共苦？」（註一〇五）。日本內閣在九月九、十日松岡•斯塔瑪非正式會議後、十四及十九日召開會議時，在場呈現一片想避免卻無法避免對美開戰的宿命論氣氛。多數閣員無奈地表示「或許支那事變能因此而解決吧」（註一〇六），日本的領導階

註一〇二 同上。

註一〇三 同上、頁四一四~五。

註一〇四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戰外交史】別卷、頁三三四。

註一〇五 同上、頁三三三。

註一〇六 同上。

層幾乎都以悲觀的態度面對此事。但惟有松岡外相相當樂觀，他企圖在三國同盟後拉近蘇俄，認為以日德義蘇四國合作將有利於日本的對華政策，並可稍加緩和日本最為匱乏的石油供給問題，自德國獲得一半的石油（註一〇七）。

三國同盟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締結。當時，一般均認為三國同盟不利於中日和平工作的推行（註一〇八）。例如，在三國同盟的同一天，接受參謀本部門松正一少佐邀請前來東京，與武藤軍務局長會談的胡蓉（藍衣社政治部情報主任胡永荃）等人，一聽到日本方面的和平條件，立即收拾行囊返國，從此斷絕連繫（註一〇九）。甚至連西義顯也說，締結三國同盟是松岡外交的一大缺失（註一一〇）。桐工作當局者與南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對西義顯謀求直接對重慶和平工作，認為是絕不可能實現，因而拒絕協助。今井武夫對於從日本外務省的層次開始著手的誘和，且其工作參與者皆為中國金融界名流的「錢永銘工作」，予以肯定的評價，認為「如果日本方面在條件上作大幅度的讓步，那麼，從目前重慶內部的情勢來看，和平工作有成功的希望」。但今井把三國同盟列入負面條件之首，認為三國同盟對和平工作有決定性的阻礙力。關於松岡對日本國內內部的和平條件不作任何調整，就冒然與重慶接觸，而且還有「以三國同盟為對重慶工作的起點」，來一舉解決問題的想法，今井也認為不妥當。同時，今井認為日本剛結束「桐工作」，就馬上展開新的和平工作，在時間上也不恰當（註一一一）。

就如同周佛海先前所預測的，重慶方面在周佛海十一月十八日訪日時，派遣使者到香港，以「錢永銘工作」的進行來阻止汪兆銘政權的正式承認。然而，對重慶方面來說，確實也蓄意回避與前來香港的南京政府代表周作民接觸。因此，根據西義顯回憶錄記載，周作民於十一月十七日離開香港之後，重慶的使者始抵達香港。西義顯回憶錄記述，由於十七日「不透露姓名的重要人物」抵港，因此在深夜十一點，西、兒玉二人被喚至九龍的連絡所與張競立、盛沛東會面，取得重慶方面所提出的二項和平條件。於是，西和田尻愛義、總領事的電信密碼員連夜趕工，將其譯為電文，預定在十八日上午電傳到東京（註一一二）。

註一〇七 同上、頁三三四~五、三三八~九。

註一〇八 【昭和研究会】頁一八五~九。【近衛文麿】頁一二八~九。

註一〇九 【初期陸軍作戰（三）：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四一〇。

註一一〇 【悲劇の証人】頁三二五、三四二。

註一一一 【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七三~四。

註一一二 【悲劇の証人】頁三七六~三八〇。

但是，根據近衛文麿所遺留，上有「陸海兩相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完畢」註釋字樣的「錢永銘工作事宜田尻電」的電文，與西義顯的記載略為不同。「十八日夜池田（西）會見木下（錢），接獲重大消息」，「志賀（蔣介石）派遣代理人L.C.P.〔三九二〕（陳布雷）來港，原則上承認安達（外相）所承諾的結婚（和平）法案，希望基於該法案盡速與櫻（日本）協議結婚（和平），請將此事正式通告來港的安達（外相）派港代表秋山（田尻）」，又「L.C.P.預定二十日前來香港，也有可能會有若干延期，但的確是為前項趣旨而來。鑑於事情之重大，須通知櫻（日本）」（註一一三）。又在同一天的「和平工作近衛備忘錄」記載，「十九日夜，陳（上將秘書）秘密來港，傳達蔣言，委囑錢代理蔣與日交涉。二十日夜，西會見錢與田尻」（註一一四）。從以上內容看來，十八日錢永銘向日方預告，重慶將派出使者來港，正式與日和談；二十日外相在港代表田尻愛義，會見代理蔣介石的重慶代表錢永銘，得知重慶方面提出的二項和平「先決條件」，雙方並當場展開具體的談判。此二項和平「先決條件」，在二十一日以報告電文呈送給日本政府。究竟這位「不透露姓名的重要人物」，是在十七日、十八日或十九日抵港，並不重要。對重慶來說，只要日本方面對錢永銘所說的“消息”深信不移，並向日本本國通知正式和平談判開始，就可達到重慶謀略目的，即使這與重慶無關，而是錢永銘一人“虛構”捏造出來的獨角戲也無妨。因為日方從頭到尾直接與重慶方面接觸的代表人物，只有錢永銘一人。而且，錢永銘在二十日搖身一變，從原來扮演和平工作的“觸媒”角色，突然間以“重慶代表”身份與日方外務省代表接觸，並展開正式的談判，難道這不叫錢永銘的獨角戲？此外，關於「不透露姓名」使者的問題，西義顯謂後來才知道使者並非是陳布雷，而是張季鸞（註一一五）。但當時的張季鸞因有其他和平工作（蘭工作），經常往來於香港、重慶之間（註一一六），因此似乎沒有錢永銘所說重慶特派使者的事實。難怪張競立與錢永銘絕不透露使者的姓名，任憑西義顯猜測（註一一七）。

註一一三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〇三。

註一一四 同上。

註一一五 『悲劇の証人』頁三七六。

註一一六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五一。

註一一七 『悲劇の証人』頁三七七。

根據近衛備忘錄記載，中國方面提出的二項和平「先決條件」，是：第一「延期承認」，理由是「若日本承認南京政府則和平面臨絕望。因中國視之為日本施壓威脅」；第二「撤兵」，內容說明是「日軍撤兵是形式上的前提，實質上以實施攻守同盟之名，讓日軍再行駐兵」；並以「附註」表明，「若承認此二點，蔣必須親自與日方代表會面，以表誠意，但蔣不是下關係約時的李（鴻章）」（註一一八）。這是指蔣介石不求和、不割讓領土、不賠償的意思。關於重慶所提的兩項和平「先決條件」，根據西義顯的記載，這是錢永銘“適當地釋義”蔣介石的信函後所整理出來的和平二條件。看過蔣介石該備忘錄的西義顯說「文書的措辭有若宣戰布告前文般地強烈，明列中日無法談和的理由，且說凡促進與日本和談者均視為漢奸，予以處置」，怎麼看也找不出任何有意談和的跡象（註一一九）。但錢永銘將“適當釋義”後的蔣函，向日方說明該函內容確實為「蔣介石有意接受和談」。當時，南京方面盛傳「重慶派出的使者並非大人物，是小卒子，而此人所攜帶的蔣介石備忘錄的內容，實為拒絕接受任何媒介的指令書」。西義顯在回憶錄中，譴責這種不利於和平工作的風聲，是周佛海派遣去的間諜李北東（李北濤），為破壞日本與重慶談和所捏造的反宣傳活動。可見西義顯不願意承認親眼看到的事實（註一二〇），寧願相信錢永銘反過來釋義的“虛構”。

在二十日錢與西、田尻正式交涉時，錢永銘向日方提出兩項「先決條件」，而日本方面也向錢永銘提出日方的條件。當日方想先確認「中國方面在原則上是否同意日本的原提案」時，錢永銘回答說「蔣所提的合作層次，應超越法案範圍」，且說「關於如何處理南京，重慶尊重日本的立場，但目前日本對南京採取保密，且暫時故意讓南京放出和平絕望的風聲」；至於撤兵，錢永銘說中日應以攻守同盟的方式，重新締結日華共同防共軍事同盟，故其防守對象包括中國共產黨（註一二一）。可見，談判桌上的錢永銘，在此時刻試圖阻止日本對汪兆銘政權的承認。然而，當天錢、田尻雙方交涉的結果，決定四大原則：（一）近衛三原則，（二）蔣汪合作，（三）全面撤兵，（四）防守同盟；其具體的施策共有五項：①日方承認二項「先決條件」，②以澳門停戰協議為原則，繼續展開和談交涉，③正式派出交涉

註一一八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〇三。

註一一九 【悲劇の証人】頁三七八～九。

註一二〇 同上、頁三七七。

註一二一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〇三。

員，④應在十二月五日前談和，⑤如未能談妥，則日方立即承認南京的措施（註一二二）。田尻愛義結束這次與錢永銘的會談後，在報告電文中表示「情況相當樂觀」，因為「中國渴望和平」，簡直就可以“恨不得馬上就得手”來形容。但田尻又在電文中說明，惟重慶方面對日本保守機密，懷有疑懼，唯恐「十八日東京UP電文」之報導會直接影響到重慶使者的行程，故田尻特別叮囑日本的中央，關於「本事項請特別注意，避免外洩」（註一二三）。所謂「十八日的東京UP電文」報導，根據唐縱日記記載，應該是「十六日」報導。其中，記載乃指有關十日松岡對美駐日大使格魯所說，日本現今正謀求與蔣介石直接交涉，請美國勿予干涉等的談話內容（註一二四）。另一方面，重慶也就以第四項具體施策中所設定的時間為目標，亦即以其十二月五日作為對「錢永銘工作」反謀略的最後期限。

唐縱是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幕僚之一，他似乎從十六日該東京UP電文報導始知錢永銘工作的存在。在唐縱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此事（松岡對美國大使之說明）或有可能。蓋日本欲藉此以離間華美之接近，因美國此時誠恐中國對日本之停戰，故以遲疑美國對華之援助」（註一二五），推測松岡的意圖在於牽制美國，同時唐縱也預估在港進行的中日和平交涉不可能成功。唐縱如此判斷是有所根據的，例如第二次近衛內閣中有東條、松岡、星野等關東軍派人物入閣，即可察知內閣政策是「明裡南進，暗中北進」（註一二六）。他又分析世界情勢，特別是日本與越南、泰國的交涉情況，以及日蘇、日德等關係。關於三國同盟，他說「自日德義軍事同盟宣佈之後，美國之所反應者，貸款與我，今日又宣佈撤退遠東僑民（約一萬六千餘人）回國，英國之所反應者，十月十八日再開滇緬路。現英美與日本的矛盾，日漸加惡，太平洋之戰爭，為期不遠矣。據日本調查，美國許多軍需品，均在研究代用品自給中，惟橡膠與錫尚無法解決，故，荷印與南洋群島，為日美鬥爭之焦點，亦為日美矛盾之分裂時期」（註一二七）。在蘇聯方面，他在十月十五日的日記中分析說「自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後，一時外交中心移至莫斯科，英美、德日各向蘇聯展開外交戰」（註一二八）。唐

註一二二 同上。

註一二三 同上。

註一二四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七五。

註一二五 同上。

註一二六 同上、頁一四二。

註一二七 同上、頁一六六。

註一二八 同上、頁一六七。

縱又述及三國同盟後的日本對華和平交涉，說「日人的確希望和平，且能降低條件與我協商，但惟須注意，日本人的企圖。今日放低條件與我言和，待南進成功，英美退出太平洋之後，則將再向我壓迫，如探囊取物。如我能利用其南進之時期，切確有所準備，作第二次之大戰，則未如不可與言和，否則，應請考慮」（註一二九）。唐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分析，就能看穿日本當前施展和平攻勢，乃是先對中國“誘和”，隨後再逼迫“降和”之企圖。

唐縱的分析，算是當時重慶政府的看法。因此，假使重慶方面運用如此微妙轉變的國際關係，來策劃所謂的錢永銘對日和平謀略，一點也不奇怪。據說，十一月二十四日晨，重慶派來的使者突然離開香港一事（註一三〇），就上述錢永銘全權負責對日交涉的過程來看，究竟是否真的發生，仍有疑問。但這可解釋為重慶方面以二十四日撤回代表的方式，採取主動與日本斷絕和平交涉的措施。然而執迷不悟的西義顯認為，這是前一天（二十三日）船津辰一郎對錢永銘所說的「即使松岡也不能變更御前會議所決定的方針」（註一三一）這一句話所惹的禍。事實上，中國不與日本繼續談和的主要關鍵，就是與蔣介石在「錢永銘工作」期間順利獲得美國對華保障有關，同時蔣介石也表明中國反對三國同盟、投靠英美的態度，因此以撤回使者的方式來表示中國再也不與日本和談。根據蔣介石親信之一的董顯光戰後所寫的傳記『蔣總統傳』，其中提到「錢永銘工作」，說「……但日本卻繼續派出和平試探者，以謀解決戰爭，甚至比諸較早被拒絕之時尤為懇切。彼時之外務大臣甚至派遣外務省之東亞局長來香港，欲與中國政府代表獲致直接的交涉」（註一三二）。

當蔣介石被“外籍友人”問到有關日本對華和平攻勢問題時，答覆說「他們至少每月一次間接的及非正式的代表其求和之意；他們日益提出較優的條件，甚至表示願從華北將日軍撤退（此乃指「桐工作」條件之一）。但我方仍拒絕考慮此類提議」（註一三三）。可見董顯光雖然說「自從民國二十八年秋季以來，和謠常在散佈。上海與香港為這種謠言宣傳最盛之地；然其來源卻與重慶絕無關係」（註一三四），但這又證明了蔣不但知道每條日本對華和平

註一二九 同上、頁一六六。

註一三〇 『悲劇の証人』頁三八二。

註一三一 同上、頁三八二～三。

註一三二 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一九六七年）頁三二一。

註一三三 同上，頁三二二。

註一三四 同上，頁三二一。

工作路線存在的事實，甚至深入了解每回和平條件內容變遷的細節與過程。「錢永銘工作」於二十四日突然“結束”，這當然與蔣的“決定”有密切的關係。董顯光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蔣總統達成一個重大意義的決定。他決定中國與英美直接採取一致行動，以對抗軸心國的侵略。從此以後，中國對於日本企圖與中國單獨解決的一切和平條件，概置之不理。此一決定為蔣總統部下所有將領與顧問一致贊同，因為動搖份子絕跡於中國的陪都了。那時的標語便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存共亡』。重慶當即宣佈，國民政府直接拒絕商談，甚至可以獲得對日光榮和平的條件」（註一三五）。蔣介石的“決定”，還獲得重慶陪都抗戰陣營的共識，並把此國民政府堅定的立場對外公布，以獲廣大中國民心的支持。「因為日本從來的和平攻勢都是具有分化影響的」（註一三六）。據說，蔣介石如此重要的“決定”，時間應該是在十月二十三日，亦即重慶獲得美國國務院向蔣保障對華援助將採取放寬限制的「備忘錄」那一天（註一三七）以後的事。那麼，可以絕對地、肯定地說，後期的「錢永銘工作」（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月）是重慶方面對日本所施展的純“謀略”；其目的不外乎利用該工作路線，試圖再次阻止日本承認南京政府問題！此後，中國就成了美國的忠實盟友。

錢永銘一人所唱的獨角戲——「錢永銘工作」，巧妙地反應了重慶對日政策的轉變。因此，周佛海訪日行程（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日）一結束，十八日到港的重慶使者就不等待日本的答覆，立即於二十四日晨離開香港。西義顯在回憶錄中說道「很遺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回電，也在二十四日早上到達香港。松岡外相於二十三日以附帶『如重慶速派正式使者前來，日本政府即延期承認南京政府』為條件，早已說服日本政府承認重慶方面的條件」（註一三八）。因此，西義顯說錢永銘又決定派杜月笙前往重慶，以求挽回之道。但杜月笙因二十五日遭受英國官方的阻擾，二十六日又無班機，因而延誤至二十七日始飛離香港。杜月笙所攜帶的是錢永銘給蔣介石的二條建議，內容是重慶應派前駐日大使許世英為對日交涉首席代表，並賦予張競立正式代表資格（註一三九），但是以後就中斷聯絡了。據說，田尻愛義接

註一三五 同上，頁三二二～三。

註一三六 同上。

註一三七 同上，頁三二三頁。『初期陸軍作戰（三）：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四一六。

註一三八 『悲劇の証人』頁三八八。

註一三九 同上，頁三八九～三九二。

二連三地，從香港拍電請求日本中央政府延期承認南京政府，以等待重慶方面回應（註一四〇）。但是，重慶這次施展反誘和目的，就是以拖延到上述錢、田尻會談時所設定的時間——十二月五日為目標，故對田尻等日方談判人員的焦慮毫不理會。

另外，南京政府方面，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經周佛海向汪等報告訪日結果後，即當場開會決議：（一）於二十七日給予蔣介石最後勸和電報，（二）於二十八日召開中央政治委員會，二十九日召開立法院會議審查日華基本條約，為南京政府的正式成立著手最後部署（註一四一）。但這一次無法消除南京方面對日的不信任感。周佛海在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記述「本日樞密院會議已正式通過全部條約，因赴汪兆銘先生處報告。汪先生對就任主席，本日忽有躊躇之意，對於三十日能否簽約，亦頗懷疑，並決心就任」（註一四二）。隨後周佛海在汪兆銘私宅與汪共進晚餐時，決定在明日的中央政治委員會中通過汪兆銘就任主席，並訂於後天上午就職。二十八日，當周佛海獲犬養健電，知道東京已確定於三十日簽約消息時，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大約重慶和平之說已證實為虛矣」（註一四三）。二十九日，周佛海獲知影佐禎昭已到南京的消息時，才放心下來。但在西尾總司令官的晚宴上，他仍然不忘向影佐打聽有關香港和談始末。在日記中說「據云，十八日到港者乃陳布雷，並云渝方面可派軍事委員到港，殊令人不置信」（註一四四）。這次周佛海沒有任何猶豫，一開始就表現出完全不相信日方消息的態度。

的確，根據日本方面所獲「錢永銘工作」情報多半不實，尤其是來自西義顯的消息，是西義顯個人的期待與焦慮下所製造出來的產物。因而，錢永銘演的獨角戲，始終未露出破綻（註一四五）。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新設的最高決策機關「連絡懇談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並決議日本在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認汪兆銘政府，貫徹「即使重慶在十一月三十日前提議停戰，亦不變更」（註一四六）的立場。十一月三十日，周佛海參加日華基本條約正式簽字儀式。當天他在日記中發抒感想，說「過去努力，告一段落，今後另開一新紀元

註一四〇 同上、頁三九一～二。

註一四一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四一五。

註一四二 同上、頁四一六。

註一四三 同上。

註一四四 同上、頁四一七。

註一四五 【悲劇の証人】頁三九〇。

註一四六 【太平洋戰爭への道・開戦外交史】別卷、頁三五二。

矣，惟此舉是禍是福，人非上帝，未有能預言者。但是，最好汪蔣之間能有默契及了解，一參加日、德、義陣線，一參加英、美陣線，將來無論兩陣線誰勝誰敗，中國均有辦法，否則雙方均孤注一擲，實甚危險」（註一四七），反映周佛海身為漢奸自我尋求解脫的微妙心境。該夜，周佛海閱畢來自犬養健的電報後，謂「田尻、船津等自港來電，深怪承認國府，至影響全面和平，豈重慶真有和平之意耶？」（註一四八）。可證明周佛海對重慶無意與日和談的判斷，從頭到尾正確無誤。

七、結 論

從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到一九四〇年入冬之際，日本對重慶展開一系列的和談攻勢，最後以「錢永銘工作」作為結束。「錢永銘工作」正是日本對以摧毀重慶政府結束戰爭策略失敗，反陷入中日泥沼戰爭中無法自拔之時，以「南進」策略來尋找突破，在時間上吻合。當時的日本，捨棄自明治以來日英同盟的傳統外交政策，決定加入反英美的日德義三國同盟，寧可對英美開戰。因此，日本擬定「錢永銘工作」策略時，對重慶所提的和平條件不願做任何的調整，更為維護汪兆銘南京政府的立場，不願意讓步。日本的「錢永銘工作」，本質上是種“謀略”，目的在於迫使重慶屈服。但是，「錢永銘工作」自始以來，一般日本當局人物即預測該工作終告失敗。這由外務省及軍部情報人員，對該項工作並未進行任何初步偵察，僅採取作壁上觀的態度，可以證明。故該誘和工作，是單憑松岡洋右與西義顯二人倔強的個性及“信念”支撐，可以說基於無論採行何種手段，非將蔣介石誘引至談判桌上不可的精神主義，予以推動的。此又是「錢永銘工作」中所包含實際“謀略”的內在因素。

如此松岡外相與西義顯在和平工作中所顯示的過度精神主義，只能說是反應當時日本的時代氣息。全日本喪失主•客觀判斷的能力，與由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新體制運動」中急欲補充資源不足的瘋狂想法，如出一轍。近衛首相明知三國同盟將不利於中日談和，且日本根本没有對抗英美、發動戰爭的實力，卻仍追隨個性倔強的松岡。軍部亦在三國同盟、「南

註一四七 【周佛海日記】上卷、頁四一七。

註一四八 同上、頁四一八。

註一四九 【對重慶諜報謀略に關する件】昭和一七年三月八日、上海大本營總司令部（文書），共二十頁。

進」策略等政策決定後，盼望對華施策出現轉機，對內更進一步邁向軍人執政的軍政之途。然而，這種日本國策決定中所顯現的混亂與不負責任地追隨“強者”的精神狀況，正象徵著代表軍閥東條英機政權的成立，及日本法西斯時代來臨的必然性。

對中國來說，日本在「錢永銘工作」上顯現對華理解不足、情報判斷能力薄弱、過度崇信精神主義等缺陷，均給予中國方面利於施展“謀略”的因素。錢永銘、張競立與盛沛東所組成的對日和平諜報群，僅顯示出積極的對應態度，就能在日本外務省及日本決策機關造成一片混亂。因為真正“恨不得馬上得手”而急於直接謀和的，乃是日本的「錢永銘工作」者西義顯個人，而不是中國重慶當局。西義顯對日本政府的決策本意瞭若指掌，但他與錢永銘交涉時，卻故意另外擬出一個符合中國方面的條件，以達引誘中國應允和平的目的。錢永銘等人似乎熟悉日本方面所施展的騙術，故意作出適當的回應，來維持日方對他若干信賴與期待，最後順利完成其對日謀略的任務。

對中國來說，「錢永銘工作」是繼「“宋子良”工作」後，中國在對日謀略戰中再度獲勝的例子。蔣介石從旁了解「錢永銘工作」，就有確認日本必敗的信心。日本發動南方作戰，使其陷入更為艱難的「三面作戰」的困境。而且這不僅使國際局勢向中國有利的方向扭轉，還使英美採取強化對華援助、支持重慶政府的態度。反觀日本，實際已經沒有餘力在對抗蘇俄、中國之外，再開南方戰場。事實上，在中國本土所進行的中日戰爭早已呈現泥濘般對峙和僵持的狀態，因此對重慶政府來說，日本不再是造成主要威脅的敵人，反而對蔣介石來說，對中國現狀之憂慮業已轉向勢力日漸擴大的中國共產黨。因此，對中國方面而言，對日反和平謀略的「錢永銘工作」，已喪失其繼續推展及在謀略上的重要性。

然而，日本方面結束「錢永銘工作」之後，仍然對和平工作抱著相當大的期望。因此，甚至在太平洋戰爭最激烈的一九四二年，參謀本部即計劃「設定以抑留支那人為主體的諜報工作」一案：力求動員「與南京政府關係非檯面化」的中國人士，策動針對蔣介石及其親信展開諜報，進而把層次逐漸轉為招降性質的工作。根據現存昭和十七年三月八日，上海大本營總司令部研究成案的「對重慶諜報路線相關文件」之機密文書（註一四九），日方在上海利用顏惠慶、周作民、李思浩、唐壽民、徐采丞等關係，對陳布雷、杜月笙、戴笠、朱家驊、董顯光、吳鐵城、王世杰、張鶴君、錢永銘、孫鶴皋展開誘和活動。另外，設定「周佛

海—錢永銘—張群」和「李士群—宋美齡、胡宗南、戴笠」的兩條路線，以便加強和談攻勢。由此可以證明，在中日戰爭結束前，日方一直都沒有徹底地了解「錢永銘工作」的真相和中國方面對於中日和平問題的真正態度，仍執意尋求各種可能管道來進行和平謀略工作。